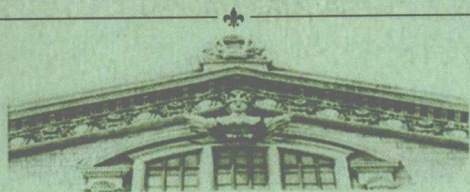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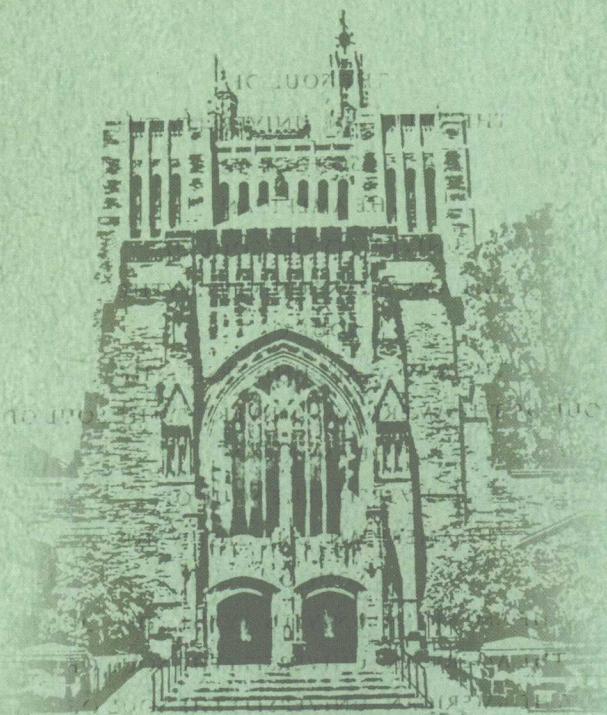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美国大学之魂



[美] 乔治·M. 马斯登(George M. Marsden)/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美国大学之魂



[美] 乔治·M. 马斯登 (George M. Marsden) / 著

徐 弢 程 悦 张 离海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46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学之魂/(美)马斯登著;徐弢,程悦,张离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7-301-14758-0

I. 美… II. ①马…②徐…③程…④张… III. 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3741号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Copyright © 1994, 1996 by George M. Marsden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4,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美国大学之魂》的英文原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印于1994年。

书 名: 美国大学之魂

著作责任者: [美]乔治·M. 马斯登 著 徐 弢 程 悦 张离海 译

丛 书 策 划: 周雁翎

丛 书 主 持: 周志刚

责 任 编 辑: 周志刚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4758-0/G·2547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33.25印张 43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平装本序



任何作者都不希望自己的著作遭到忽视,所以我既要感谢那些赞同本书观点的人所付出的热情,也要感谢某些反对它们的人所付出的精力。如此热烈的讨论本身就足以证明本书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因为关于宗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争论仍在持续。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本书将以一个能够被更多读者所接受的价格得到出版。

虽然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研究,但是很多评论者却更为关心它那“非科学的最后附言”。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有时候把这篇附言视为了“一条挂在长达 400 页的正文后面的、只有 16 页长的尾巴”。我对这种评论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不希望自己的历史观点遭到忽视。另一方面,这篇附言又与前面的论述密切相关,而且我高兴地发现:它们的结合有助于激起某些严肃的讨论来澄清宗教信仰与学术活动之间的关系。我已经收到了不少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写了一部简短的续集——《难以容忍的基督教学术观念》(牛津,1996)作为这篇附言的拓展。

虽然我认为自己必须通过大量描述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在十九世纪晚期的创建过程来支持我的历史观点,但是我知道由此导致的冗长可能会吓跑某些读者或者妨碍本书的课堂应用。因此,如果有的读者希望找到更加简短的相关描述,我建议他阅读一下本书的绪论、导言、三个部分的介绍,以及它的第 3、4、6、7、9、10、14、16、18 章和后记。其他九个章节同样探讨了一些重要的主题和有趣的事例,我希望它们能够引起大多数读者的兴趣,但是本书的精简本同样自成一体。

乔治·马斯登

1995 年 11 月

序



为了使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变得易于理解和研究,我按照大的主题着重考察了美国的主要大学及其前身的关键历史时期。因为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大学为其他大多数高等院校树立了典范,所以我着重考察了这些具有开拓性质的大学。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而言,这种做法都可以使资料变得易于处理,尽管它也意味着许多事件将遭到省略。例如,我没有过多地讨论那些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还保持着基督教特色的、成百上千的小型宗教学院,虽然这些学院是大学式教育的重要补充。我的兴趣在于那些最终决定了大多数宗教学院的发展前景的大学,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为其他的学院培养教师。

我也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天主教的学院和大学上,因为在美国的学术生活中,它们同样没有确立多少主导性的准则。长期以来,女子学院、非洲裔美国人学院、大多数南方学院和大学以及保守的新教学院都被边缘化了,造成这种边缘化的原因来自那些在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确立了最重要的准则的大学。尽管前者可能在它们自身的领域里有着相对出色的表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未能涉足划时代的学术活动。虽然宗教在这些院校中的历史影响可能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和价值,但是它们并非美国大学历史的核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描述出这些院校的边缘化的意义。同样,虽然我没有密切关注为数不多的犹太教育机构,但是却着重描述了犹太人的作用在 20 世纪的大学中的快速增长以及新教对此做出的反应。

任何一部讨论美国大学的起源的历史著作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外来的模式创建的,尤其是按照英格兰、苏格

兰和德意志的模式创建的。任何一份关于宗教在现代大学中的影响的历史记录都必须提到上述国家的文化和大学的基督教化与非基督教化,并且将这些过程与美国的发展相对照。如果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发展时能够考虑到那些融入了美国历史的外来因素,我们将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其他的东西。

因为本书所叙述的主要是新教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创建过程中的影响,所以它要考察的历史主要限于新教建制尚未受到撼动的时代。它论述的重点是美国高等教育得以基本成型的 19 世纪晚期,不过它也回顾了美国高等教育得以起源的殖民地时期和 19 世纪早期,并且一直追溯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最后一章从总体上描绘了这些历史的当代意义。

正如我在绪论中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主要兴趣是探讨宗教观点为什么可以影响到大学的学术活动。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个具有启迪性的方面,那就是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在本科教育以及大学的神学院当中。而在研究生教育和其他专业教育中却几乎乏善可陈。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最有意义的说明;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宗教影响几乎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所以我们很难对它的极端重要性加以相应的探讨。

我对大学里的神学院的重视也微乎其微。因为我的兴趣是探讨当代美国学术活动中的主导因素是如何在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把宗教观点排除在大学的其他部分之外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它们的兴趣局限在神学院里。例如,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几所高校都曾把神学院视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次要的部分。然而,即便在这些神学院的鼎盛时期,它们的存在对于大学的其他部门而言也是反常的和令人困惑的。况且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拥有神学院。因此,尽管大学神学院的历史具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它们所服务的教会而言,*但是对于美国学术活动的核心特色的形成而言,传教活动和神学教育都未能发挥持

* 百合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来研究这些机构,这种研究对于探讨美国新教的主要派别的历史很有意义。特别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格伦·米勒(Glenn T. Miller)的《虔诚与理智:战前神学教育的目标与目的》(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0),以及康拉德·彻丽(Conrad Cherry)即将付梓的作品《奔向天国:大学、神学院与美国新教,1880—1980》,她曾经慷慨地让我参阅了该书的初稿。

久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仅仅把次要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服务于大学社团的民间宗教的作用上。尽管这样的宗教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与大学的主要事业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宗教的角度看,我们不妨认为宗教关怀被有效地排斥在了现代大学生活中的最有影响的领域之外,而它们则对这种排斥做出了有意义的补偿。

因为本书所涵盖的面十分广泛,所以尽管我做出了这些限制并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寻找原始资料,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借助了二手资料。当然,我利用二手资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本书的综合性。我在注释中列出了大量的二手资料作为相关问题的参考书目,它们说明历史学界的同仁使我受益匪浅,并且表达了我对他们的工作的感谢。在我的所有作品中,本书最能使我认识到学问是怎样从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中脱颖而出的。

乔治·M. 马斯登
圣母大学,印第安纳
1993年7月

致 谢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是帮助我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的主要机构,而本书正是从这种交流中产生出来的。他们长达四年半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学者,而就是这批人为本书提供了研究基础。这家信托基金会的宗教项目部负责人马丁·垂伯和约耳·卡彭特分别对这项研究计划的发起和后来的监督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还要感谢罗伯特·林恩,因为他在百合基金会(Lilly Foundation)工作期间把这项研究计划推荐给了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在为这项研究计划作出了贡献的合作者中,我最感谢布瑞德利·朗费尔德。作为我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合作者,他以一位顾问、伙伴和朋友的身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达里尔·哈特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担任了一年的合作者并且在随后担负了顾问工作。我特别感谢他从繁忙的日程安排中挤出时间向我提问,有时候甚至是在杜克大学高尔夫俱乐部这样的地方为我充当无偿的顾问。保罗·克门尼在担任我的合作者期间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需要感谢的合作者还有黛安娜·巴特勒、斯科特·菲利普斯、菲利普·高夫、莉斯·贺克森、托尼·耶金斯、凯瑟琳·朗、罗杰·罗宾斯和杰弗里·提克斯勒,他们都向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我要再次感谢杜克大学在1990年春季举办的学术会议的参与者以及《高等院校的世俗化》(乔治·马斯登和布瑞德利·朗费尔德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的撰稿者。我尤其要感谢杜克大学为我的研究计划提供的经费和支持。杜克大学神学院院长丹尼斯·坎贝尔对这项研究计划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和鼓励,他使我受益匪浅。克莱拉·戈德温和她的助手谢尔



比·沃伦总是热情而有效地为我管理经费开支。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交流机会,我得以与该系的同行进行有益的合作,我对此表示感谢。圣母大学、弗朗西斯·麦卡兰尼主任和他的家族为我完成这项研究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许多有影响的学者曾经评价过本书的初稿。其中包括达里尔·哈特、保罗·克门尼、布拉德利·朗费尔德、亨利·梅、马可·诺尔、乔治·劳力克、温顿·索尔博格、詹姆斯·特纳和格兰特·瓦科尔。我深深感谢他们所给予的建议、鼓励和编辑意见。在我从事这项研究期间,亨利·梅一直是我的朋友和非正式的顾问,他还是一位最认真的批评者和本书初稿的编辑者。乔治·劳力克也给予了我可贵的友谊、鼓励和忠告。我还要感谢圣母大学的研究生斯科特·菲利普斯、约翰·哈斯、迈克尔·济廷和比尔·斯韦尔莫等人所做出的有价值的评价。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辛西雅·里德又一次对我的写作风格提出了极好的建议,这已经超出了作为一名资深编辑的她所应尽的义务。我也要感谢卡罗尔·施瓦格的编辑工作,卡伦·约旦的校对工作,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欧林和保罗·斯考霍尔的巨大帮助。格雷格·马斯登为我打印了本书的校订本。布莱勒对我的帮助是独一无二的。潞西对我的帮助是无法估量的。长期置身于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之中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写作本书的岁月是我所经历的最美好的岁月之一。

“令人费解的学术自由观念”是我在1992年为美国教会史学会发表的主席致词,这篇刊载在《教会史》第62期(1993年6月)上的致词是从本书中提炼出来的,尤其是从第16章和后记。

目 录



绪论 / 1

导言一 上帝与耶鲁的巴克里(1951) / 8

导言二 亨利·斯楼恩·科芬的耶鲁(1897) / 16

导言三 一所“基督教学院”? 诺亚·波特与威廉·格拉姆·
萨姆纳的耶鲁(1879—1881) / 21

第一部分 新教无宗派主义的确立

1 基督教王国的负担:17 世纪的哈佛 / 31

2 新的科学女王与新的共和政体 / 48

3 两种宗派主义 / 72

4 一种辉格党式的正义舆论 / 84

第二部分 科学时代的美国大学之定义

5 美国的实用与德国的理想:对改革的两种设想 / 109

6 科学时代的基督教遗产 / 122

7 诺亚·波特治下的耶鲁:积极的基督教与实证主义 / 134

8 加利福尼亚: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成分的革命 / 146

9 霍普金斯大学的方法世俗化及其基督教原理 / 164

10 密歇根大学的自由派新教:带来了杰斐逊主义的后果的
新英格兰动机 / 184

11 哈佛与人道宗教 / 201



- 12 在普林斯顿坚守 / 219
- 13 使世界免受传统建制的危害 / 247
- 14 低教会派的大学理念 / 267

第三部分 当联系切断之后

- 15 旧式的宗教所带来的困扰 / 301
- 16 令人费解的学术自由观念 / 330
- 17 基要主义者的威胁 / 359
- 18 基督教的生存障碍 / 377
- 19 局外人 / 406
- 20 寻找一种灵魂 / 420
- 21 一个拥有国家灵魂的教会 / 443
- 22 没有新教的自由派新教 / 464

非科学的最后附言 / 488

中英译名对照表 / 505

译者后记 / 514

绪 论



本书要探讨那些具有开拓性的美国大学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它尤其要从宗教的角度思考它们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那些在 19 世纪晚期为美国大学制定了最初准则的人是在强大的新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大学的建立者大都是活跃的新教徒,有不少还是忠实的信徒。虽然他们没有严格恪守自己的先辈所信奉的福音派*传统,但是他们依然献身于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在第二代、第三代美国大学乃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美国大学之中,几乎每所开拓性大学的领导者都具有新教背景,都拥有新教精神所塑造的观念,都时常赞美他们的基督教传统。

在美国大学得以形成的 19 世纪晚期,北方主要宗派的新教教义在实质上充当了宗教与文化的法规。这种国教思想在美国大学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因为正如你们所料想的那样,美国大学在创建之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俗机构,而是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新教的无宗派主义的影响力体现为宗教活动在大多数大学校园里的持续存在。例如,在 19 世纪 90 年代,几乎所有的州立大学仍然把去教堂做礼拜视为强制性的规定,有的大学甚至规定必须在星期天去教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的礼拜活动才逐渐变得稀少起来。同时,许多一流的私立大学仍然保留着基督教的神学院,而且就在 20 世纪上半叶,它们还建造了一些华丽的教堂来表达对基督教传统的尊重。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不少一流大学的发言人还时常把他们的大学称为

* “福音派”(evangelicalism)这个词从未有过正式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的“福音派”指的是那些反对天主教并且注重重生得教的教义的新教教会和信徒。——译者注



“基督教的”机构。

这些新教建制的遗迹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令人感到好奇,而且是因为它们具有实践意义,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确切地说,它们为我们进一步发掘新教建制与美国大学的创建过程之间的广泛联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尽管美国在形式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化核心却始终为新教的教义所主导。早在19世纪上半叶,新教的领袖就已确立了他们的文化霸权。在这场文化征服中,他们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在实质上取得了一切有影响的美国大学的控制权,包括州立大学的控制权。主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新英格兰移民在这项事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确立了其他人试图效法的准则。他们在政治上是辉格党人和后来的共和党人。作为清教徒的后裔,他们是把这个国家的崇高道德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热情和技术进步相结合的改革者。当他们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后的那段时期,没有任何群体能够挑战他们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在教育上尤其如此。正是这份遗产的继承人——他们走过了惊天动地的民族冲突的时代并且继承了为上帝和国家服务的文化使命感——建立和主导了美国的大学。

当然,这些人所继承的传统和他们所建立的大学绝不仅仅是新教教义的产儿。它们同样反映了诸多实用性的、技术上的、专业上的和经济上的影响。然而,这些人是在一个充满着如此强烈的国家道德理想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如果他们不从自己所继承的宗教传统出发来看待他们的实践目的,那么这种现象就值得思考。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所继承的基督教理想,而只是对这种理想加以调整,以便使他们的使命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的形成有可能反映了实用性的影响和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大学所代表的理想及其在实践中做出的选择都来自于一种强大而独特的新教精神,这一认识是具有启发性的。即便某些重要的教育观念似乎没有特殊的宗教色彩,它们也同样是通過美国的新教传统得以传播的,例如,来自启蒙时代的科学准则,来自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理想,个人发展的浪漫原则,或者美国人对于德国大学理解等。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段历史,即思考这些大学借助新教传统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思考新教传统如何影响了这些大学,那么我们将马上发现一个惊人的悖论。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在信奉福音主

义的新教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多数重要大学都是直接从这些 19 世纪的学院演化而来。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保持着明显的福音主义色彩。它们的院长大都是神职人员,这些人或是在讲授基督教的圣经课程,或是在校园里领导定期的宗教复兴活动。然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就变得与那些福音主义的教条格格不入了,尽管它们仍然可能在发扬它们所继承的福音主义精神。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旧式学院里的福音主义新教教义已经被有效排斥在了重要大学的课堂之外。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悖论变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许多本来源于自由派新教的力量最终成了反对自由派新教的力量,它们把传统的福音主义从大学教育中赶了出去。^① 如今,尽管自由派新教的精神可能幸存了下来,但是几乎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都被排斥在了正规的大学教育之外。

如果我们考虑到主流社会对罗马天主教的看法,那么这个莫大的讽刺在新教所主导的美式教育中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一方面,新教建制所代表的理想包括自由、民主、仁爱、正义、革新、包容、“兄弟情谊”和服务。教育被视为一种将其他传统融入于包含这些理想的美国传统的手段。尽管美国文化的领导者常常未能实践它所表达的理想,但是这些理想本身在美国文化的所有子系统中都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如许多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天主教教育家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又是专制的和排他的。

美国新教的领导层决心拥有一套规范的教育体系并且把天主教背景的大学视为二流大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新教徒持有一种普遍主义的学术理想,支撑这种理想的是启蒙时代关于普遍的科学的假说以及关于人类有能力实现普遍的道德理想的乐观主义。众所周知,在美

① 在本书中,我常常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由派新教”(liberal Protestantism)这个术语来更加方便地表示美国主流教派的领导层。例如,美国浸信会(北方浸信会)、联合卫理公会、美利坚合众国联合长老会、联合基督教会(包括更早的公理会)、美国圣公会、基督门徒会、信义宗教会,以及其他与联邦基督教协会及其前身——全国基督教协会有联系的教会。尽管这些团体之间和它们的内部都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至少就神学上的包容性和宽容性而言,它们的领导层都是“自由的”。来自这些团体的大学领导人在神学上通常也是自由的,尽管也有不少例外。有时候,我还会把“新教主流派”用作这些团体的代名词。“福音主义”(Evangelical)也有许多不同的意思。在本书中,我常常用它来指称那种特别强调《圣经》的权威的新教传统,该传统认为《圣经》是关于上帝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活动的可靠历史记录,并且至少对强调皈依的宗教复兴运动持同情态度。

国的主要大学得以形成的时代,天主教大学的存在被视为了一种矛盾。

因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教的普遍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普世主义)最终变成了一股把宗教观点排斥在最有影响的美国学术机构之外的力量。与那些通过多样性的教育体系来解决多元化问题的西方国家不同,美国人倾向于建立一元性的和同质性的教育体系并且把其他的教育模式边缘化。几乎在美国大学刚刚起步的时候,他们就把大学的学术活动严格局限在自由派新教的或者“无宗派主义的”范围之内而达到了这样的普遍性。在一段时间内,自由派新教还被允许扮演教士的角色,例如,建立教堂或者祝福这样的学术安排之类。然而到了最后,就像那些被自由派新教所边缘化了的其他宗教观点一样,自由派新教本身也合乎逻辑地被它所倡导的公共生活中的无宗派主义理想边缘化了。由此导致,“包容性的”高等教育在事实上把一切宗教观点都排挤在这个国家最高级的学术活动之外,从而解决了多元化问题。

这样的叙事方式表明,在不做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思考宗教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明智之举。一方面,它是一部政教分离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世俗化的历史。在那些完全信奉世俗价值观的人看来,这两种描述历史的方式可能是相互和谐的,而且都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对于这样的读者来说,思考当代大学里的那些令他们喜爱或者厌恶的事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来自新教传统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另一方面,在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则可能遭到负面的评价。政教分离听起来似乎是一件好事,然而世俗化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当它意味着把宗教排斥在那些可以决定人们的信念的重要公共领域之外时,它似乎又是不受欢迎的。

对于那些关心宗教对美国人的生活的影晌的人来说,特别值得关心的事情可能是,这场极具自发性并且备受赞誉的政教分离运动在事实上导致了生活的世俗化,或者导致宗教观点被排斥在主要的学术活动之外。尽管今天的美国大学仍然允许人们在无关学校痛痒的个人生活中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但是它们都反对或者鄙视那种把明显的宗教观点与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做法。换句话说,宗教自由并没有触及美国文化中的主要学术中心。由于这样的排斥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了

关于大学生活的定义,所以许多人甚至已经对它们见怪不怪了。他们也没有对这些打着学术自由旗号的排斥行为感到奇怪。

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要说明:在美国的新教建制中存在着某些不良特征,它们必将给美国的政教分离制度带来同样的弊病。^① 在后来的美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有着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与新教有关的院校都在实质上把它们自身视为了公共机构。由于它们承袭了来自欧洲的国教传统,所以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整个美国社会所共有的理想与新教所特有的理想区分开来。在经历了正式的政教分离之后,这种把宗教遗产等同于文化遗产的做法又被它们永久化了。正是通过在事实上拓宽新教的定义,它们才得以凭借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的名义保持了自己的文化霸权。

我们在理解和评价美国宗教的角色转变时应该记住,造成这种转变的最大力量绝不仅仅限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内部。更确切地说,美国的变革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变革的组成部分,而西方文化的变革至少从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从科学技术和近代启蒙思想兴起的时候起就一直在不断加速。这种巨大的变革涉及西方文化中错综复杂的各个方面的政教分离化和世俗化过程,它们导致了现实主义的觉醒以及工作方式和其他人类活动的理性化,而且技术、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革都是更加广泛的西方文化潮流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在美国表现出了独特的形式。此外,尽管美国人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构了大学,但是大学并非美国人发明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直接受到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的教育模式的影响,后者的形成又源于那些在上述国家的变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尽管如此,然而,只要我们在心中记住了这幅更加广阔的图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力量以及欧洲人所特有的那些模式是如何在美国的历史上反映出来的。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我用来描述这部历史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自己的观点的影响。因为坦诚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他们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自传性的,我始终认为作者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

^① 这段评价粗略地引用了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的观点,即一个国家的政教分离制度的特征将类似于这个国家以前的国教制度的特征。*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以便读者对它们加以思考。我高兴地看到这种做法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做法,这要部分归功于那些倡导女权主义的学者。我的观点是一位恪守改革宗神学传统的新教徒的观点。该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教育中注重信仰与个人学术活动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它反对把那些关于上帝、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意志以及上帝的戒律的信念仅仅局限于神学之中,而主张运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思想和人际关系的其他方面。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这种学术活动的可能性,这些经历常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加尔文学院的经历,我曾经在那所学院里从教多年并且与那些研究美国宗教史的同事们和睦相处。^①然而,尽管这些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它们很少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大多数美国学者几乎不知道现在依然存在着与信仰有关的传统学术活动,而且即使知道,他们也常常把它视为蒙昧主义的产物。我现在从事的这项研究根源于我所感到的一个困惑,那就是,这些观点为何会像其他基督教宗派和其他宗教传统的观点一样,被广泛地排斥在美国主要大学的学术活动之外。

正因为最高级的学术活动并非注定要排斥宗教的立场,所以我们有必要想一想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大学把这种排斥视为它们的使命。这样的观点是在不久前产生的。在美国,这些观点主要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尽管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欧洲祖先那里。在我们的历史分析中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观点所依据的很多理由已经不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那么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被最主要的学术机构所依据的准则?

我认为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本书并非一篇对那个由基督教来主宰美国和美国教育机构的黄金时代的悼词。相反,它是对那种旧体制的批判。更确切地说,它批判性地分析了一种与我自己最接近的新教传统,即改革宗(如公理宗和长老宗)的传统*。长期以来,美国一流大学一直以这种传统为准则。然而,这个分析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指

① 我曾经概述过传统的新教学术研究的优缺点,参见“The State of Evangelical Scholarship,”*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17 (June 1988), pp. 347—360。

* 改革宗(Reformed Church)亦称归正宗或加尔文宗,它与安立甘宗(圣公会)和路德宗(信义会)共同构成了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归正的意思是经过改革而复归正道。在美国,归正宗因其组织形式上的特点而可以通称为长老宗。然而在实际中,尽管所有的长老宗教会都可以归于归正宗,但是并非所有的归正宗教会都实行长老制(如公理会)。——译者注